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调查报告

总顾问 陈奎元
总主编 王伟光



互助土族自治县卷

本卷主编 秦永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调查报告

总顾问 陈奎元
总主编 王伟光



互助土族自治县卷

本卷主编 秦永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互助土族自治县卷 / 王延中主编;
秦永章分册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61-6067-1

I. ①中… II. ①王…②秦… III. ①土族-民族地区经济-经济
发展-调查报告-互助土族自治县②土族-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调查报告-互助土族自治县 IV. ①F12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83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宫京蕾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361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1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调查》

项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

总 顾 问 陈奎元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王伟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丹珠昂奔 李 扬 李培林 李 捷 陈改户 武 寅
赵胜轩 郝时远 高 翔 黄浩涛 斯 塔

专家委员会

首席专家 王延中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卫东	丁 宏	丁 赛	马 援	王 平	王希恩
王 锋	开 哇	车明怀	扎 洛	方 勇	方素梅
尹虎彬	石玉钢	龙远蔚	卢献匾	田卫疆	包智明
吐尔干·皮达		朱 伦	色 音	刘正寅	刘世哲
刘 泓	江 荻	赤列多吉	李云兵	李红杰	李 克 强
吴大华	吴 军	何星亮	张若璞	张昌东	张继焦
陈建樾	青 觉	郑 堆	赵立雄	赵明鸣	赵宗福
赵剑英	段小燕	姜培茂	聂鸿音	晋保平	特古斯
俸代瑜	徐 平	徐畅江	高建龙	黄 行	曹宏举
曾少聪	管彦波	毅 松			

项目工作组

组 长 扎 洛 孙 懿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赛 孔 敬 刘文远 刘 真 李凤荣 李益志
宋 军 陈 杰 周学文 程阿美 管彦波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

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 王伟光

执行主编 王延中

编辑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赛	马俊毅	马 骅	王伟光	王延中
王希恩	王 锋	方 勇	方素梅	尹虎彬
包胜利	色 音	刘正寅	刘世哲	刘 泓
刘海涛	孙伯君	李云兵	吴兴旺	张国春
张继焦	陈建樾	周竞红	庞 涛	赵明鸣
秦永章	贾 益	黄成龙	曹宏举	曹道巴特尔
曾少聪	蓝庆元	管彦波		

编辑工作组 任 明 宫京蕾 孙 懿 扎 洛 宋 军

总 序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观点，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在世界上赢得广泛赞誉。丰富多彩的成功实践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沃土。时代呼唤理论创新，实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快速发展和剧烈社会转型，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创新，而扎扎实实开展调查研究则是推进民族研究事业适应时代要求、实现理论创新、服务发展需要的基本途径。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应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之需，我国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调查，今称“民族大调查”。这次大调查搜集获取了大量的有关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丰富资料，形成 300 多个调查报告。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 400 余种、6000 多万字的民族社会历史建设的巨大系统工程——《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针，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新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各民族逐渐摆脱了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状态,正在向文明富裕的现代化社会迈进。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民族之间以及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问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生态问题,日益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紧迫问题。深入民族地区开展长期、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把握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时代赋予民族学工作者的使命。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一直把调查研究作为立所之本。1956年成立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1958年成立的民族研究所(1962年两所合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第一次民族大调查催生的结果。作为我国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的民族问题专业研究机构,民族所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几代学人已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近1000个点进行过田野调研。20世纪90年代,民族所进行了第二次民族地区典型调查,积数年之功完成了20余部调研专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对我院“三个定位”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主攻方向,民族所集思广益,经过反复酝酿、周密论证,组织实施了“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这是我国民族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在充分利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调查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次民族大调查将选择60—70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包括城市、县旗或民族乡)作为调查点,围绕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文明建设而展开,计划用4—5年的时间,形成60—70个田野调查报告,出版50部左右的田野民族志专著。民族调查是一种专业性、学科性的调查,但在学科分化与整合均非常明显的当代学术背景下,要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开拓性的成果,除了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外,还需结合社会学问卷调查方式和国情调研、社会调查方式,把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典型与一般有机结合起来,突出调查研究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区域性。这是新时期开展民族大调查的新要求。

立足当代、立足中国的“民族国情”，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地区繁荣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希望立足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针对性地开展如下调查研究：（1）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调查研究；（2）民族地区社会转型、进步与发展调查研究；（3）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问题调查研究；（4）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调查研究；（5）民族地区宗教问题调查研究；（6）民族地区教育与科技调查研究；（7）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加强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切实发挥智库作用的重要保障。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通过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我们冀望努力达成以下几个目标：一是全面考察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凝练和总结中国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确立和谐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经验，把握民族工作的一般规律，为未来的民族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贡献。二是全面展示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展示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民族关系的当代发展状况，反映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增强各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三是深入调查探寻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为党和国家全面了解各民族发展现状、把握发展趋势、制定未来发展规划提供可靠依据。四是通过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扎实系统的调研，搜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构筑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基础信息平台，夯实民族研究的基础，训练培养一支新时代的民族问题研究骨干队伍，为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地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我们深信，参与调查研究的每一个专家和项目组成员，秉承民族学人类学界前辈学人脚踏实地、不怕吃苦、勤于田野、精于思考的学风，真正深入民族地区、深入田野，广泛汇集干部群众的意见、倾听干部群众的呼声，通过多种方式方法取得丰富的数据资料，通过科学严谨的数据分析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会成为新世纪我国

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一定会为党和政府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为促进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新发展，为在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伟光

前 言

在祁连山南麓，湟水河北岸，有一片美丽的地方，人称“彩虹的故乡”，它就是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互助土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36^{\circ}30'$ — $37^{\circ}10'$ 、东经 $101^{\circ}45'$ — $102^{\circ}45'$ 。北依祁连山支脉达坂山与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毗邻，东南、西南与乐都县和西宁市接壤，西邻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南以湟水为界与平安县隔河相望，东西长 86 千米，南北宽 64 千米，总面积 3423.9 平方千米。县城所在地威远镇，地理坐标为北纬 $36^{\circ}47'$ — $36^{\circ}52'$ 、东经 $101^{\circ}54'$ — $102^{\circ}02'$ ，距西宁市 32 千米。

本县地处祁连山南麓，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错嵌接地带，地势北高南低，自然倾斜度 2.03 度，全县最高海拔 4200 米，最低海拔 2100 米，平均海拔 2700 米。境内山脉纵横，山峰众多，山体构成复杂。全县海拔在 3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68 座，海拔在 4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26 座。县境北部和东北部有达坂山和龙王山，东部有阿米多藏山、麻钱山、娘娘山和先克山，东南部有松花顶俄博，诸峰海拔高，山势陡峻，岭脊尖峭，巍巍壮观，一般山体多为石灰岩、花岗岩、麻岩、千枚岩、石英岩等，上半部多为裸露山石，下半部为灌木丛林、草场，适宜发展畜牧业。西北部则有平顶山和扎坂山，南部分布有众多的土石山和土岭。

由于受地形及海拔的制约，境内气候、植被、土壤、生物等自然条件呈明显的垂直分布状，可分为河谷地带（川水地区）、低山丘陵地带（浅山地区）、中山地带（脑山地区）、高山地带四个类型。各地带由南向北，海拔逐步升高，呈阶梯状分布，县城南端是海拔 2100 米的湟水河谷盆地，向北是海拔 2400—3500 米的丘陵、中高山地带，其间山岭相连，峰峦迭

障,沟壑纵横,山川相间,地形较为复杂。北部至东北部一线,属高山地带,最高海拔达4384米,县境高差2270米,青石岭自北向东南延伸,将县境分成两大天然地形单元,即前山和后山。前山主体为农业区,后山主要为林、牧区。境内有6条天然河流,总长289.5千米。

境内气候属大陆寒温带气候,冬季受西伯利亚季风和寒流影响,夏季受东南沿海台风影响,春季干旱多风,夏季凉爽,秋季雨量集中,冬季寒冷少雪,冷凉气候特征明显。最近一个时期,年平均气温为4.5℃,极端最高气温为31.1℃,极端最低气温为-21.6℃。年日照时数为2563.8小时,无霜期112天,年降水量482.5毫米,年蒸发量1236毫米,年相对湿度64%,年平均风速1.3米/秒,雷暴日数30天。

目前,全县总面积3424平方千米,县辖8镇11乡,8镇即威远镇、丹麻镇、高寨镇、南门峡镇、加定镇、五十镇、五峰镇、塘川镇,11乡即红崖子沟乡、哈拉直沟乡、东山乡、东和乡、东沟乡、林川乡、台子乡、西山乡、蔡家堡乡以及松多藏族乡和巴扎藏族乡,共有294个村民委员会,11个居民委员会。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土族总人口为289565人,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二省,其中青海省土族人口204413人,主要分布在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以及西宁市、海东市等地;甘肃省土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等地。2011年6月,土族被纳入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制定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中。

互助县虽然是土族自治县,但民族构成仍以汉族为主体,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县人口合计356437人,其中汉族263456人,占常住总人口的73.91%。全县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中数量排前6位的依次为土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和撒拉族,其中土族63680人,藏族21203人,回族7674人,蒙古族178人,这6个少数民族人口之和占全县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9.86%。土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17.87%,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68.49%。汉族绝大部分居住在县城附近或河谷、川水、浅山地区,土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浅山、脑山地区的东山、东沟、五十、丹麻、威远、松多、嘉定、东和、台子等乡镇,藏族主要聚居在巴扎、加定、松多、南门峡、林川等乡镇,回族主要聚居在高寨镇东村、中村、西

村、双树乡什字村，在加定、西山等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民族分布总体呈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人口居住密度总的情况呈波浪形，县城高于农村，河谷地区高于浅山地区，浅山地区高于脑山地区。

土族自称“蒙古尔”（mongol）、“蒙古尔昆”（mongol kun，意为蒙古人。昆，系土族语“人”之意）、“察汗蒙古尔”（qagan mongol，意为白蒙古）等。藏族称土族为“霍尔”（hor），汉、回等民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土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经过各方面协商确定的族称。

关于土族的族源，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相关专家、学者对之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或看法，概而言之，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为蒙古说，认为土族是以蒙元时期入居河湟地区的蒙古人为主，吸取汉、藏等民族成分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故自称为“蒙古尔”，此观点是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也是长期以来通行的一种主流看法。最近时兴的另一种观点则为吐谷浑说，认为土族是公元4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立国青海达350年之久的吐谷浑汗国被吐蕃所灭后，其国人之一部分随其王室东迁归唐，除大部分留居故土被吐蕃同化吸收者以外，尚有一部分在河湟地区繁衍生息下来，到蒙元时期，蒙古族迁入河湟地区与这部分人融合并吸收藏、汉等民族成分，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此外，多源说也是目前解释土族族源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学术观点，其核心在于强调了不同地区土族来源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特点，但却没有明示决定其民族属性的最主要的来源问题。虽然目前受各种因素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由于历史文化的资源化、产业化倾向及其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乃至族源认同的工具论倾向等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关于土族族源的争论似乎已经变得不再单纯且仍将继续下去，但不可否认，土族是以蒙元时期的蒙古人为主体的，并融摄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新生民族，这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总之，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正本清源，避免错拜了祖先，这是对历史负责的一种态度，同时希冀历史更加悠久，源远流长，也属正常的民族情感，但历史证明，源与流是辩证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源远流未必流长，流长无须源远，一源多流、多源并流、源流互化，始终贯穿于民族形成、发展与变迁的整个过程。土族作为特色鲜明的民族共同体，其文化不仅兼具游牧与农耕、民族与地域之特色，其多样性、包容性特点也十分明显，这集中体现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习俗

礼仪、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民族传统体育等诸多方面。

现在,土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兼信道教、萨满教。土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没有传统文字。

土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有关土族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既已开始,主要是对土族语言及历史方面的研究,俄国学者波塔宁(G. N. Potanin)于1885年到今青海民和收集土语三川方言,后在其所著《中国之唐古特土伯特边地及蒙古中部》(1892)第二册中录有三川土语。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天主教神父田清波和斯迈德依据互助沙塘川那林沟语言材料,撰写了以《甘肃西部蒙古语蒙古尔方言》为题的三部著作《语音》、《土语词典》、《语法》。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比利时神父许让在今互助土族地区传教期间,对土族的历史和文化等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留下了堪称巨著的研究成果《甘肃边境的土族》三大册,即《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1954)、《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土族族谱》(1961)等。相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稀疏,主要有陈寄生的《甘肃青海“土族”之史的考察》(1941)、杨堃《甘肃土人的婚姻》(1943)、韩儒林的《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1944)、卫惠林的《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1947)等。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土族的研究逐渐增多,领域不断拓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土族的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化等得到一次较全面的调查,其主要成果随后陆续编印发行,即《土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概况》(1963)、《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1985)等。进入21世纪以后,土族的研究全面展开,研究成果丰硕,其中相关互助地区的调研专著有《土族:青海互助县大庄村调查》(“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004)、《互助县·土族卷》(“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2006)等。

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土族及土族聚居区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但相对而言,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和传统文化领域,涉及当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相对较少,现实问题,尤其是反映进入21世纪以来土族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不够。

2013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担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

项《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项目获准立项,本课题《21 世纪初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作为其中的一个子项目也随之立项。

本课题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旨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客观系统地反映 21 世纪以来互助土族自治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教育、卫生等各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全面展示当地人民生活的变化,总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分析 21 世纪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且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同时,通过本项课题为学界增添 21 世纪初互助土族自治县综合调查的宝贵资料,以便与上述调研及成果形成一种自然接续的关系。

课题组由秦永章、梁景之、李丽、李臣玲、鄂崇荣、侯红蕊、哈斯其木格、杨学燕、马骏驰九位成员组成,由秦永章同志任组长,梁景之同志任副组长。经过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课题组成员于 2013 年 6 月底至 8 月初深入互助县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期间,我们先后走访了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并在县委、县政府的 40 多个职能部门进行调查,收集到了大量的文字及访谈资料。此后我们又先后深入五十镇、东沟乡、加定镇、威远镇、丹麻镇的部分村、社,以及佑宁寺、却藏寺、五峰寺、“彩虹部落”、互助青稞酒厂、北山国家森林公园、民族中学、职业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及寺院,通过座谈会、入户调查、深度访谈、问卷和查阅等形式展开调研活动,收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课题组成员结束调研任务后,随即进入课题报告的撰写阶段,最终形成了本调研报告。

该报告共由九章组成,具体内容有:

第一章内容为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分三个阶段叙述和呈现了互助土族自治县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确立过程和现代经济发展变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互助县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近十年来,互助县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2012 年,全年完成县内生产总值 69.04 亿元,同比增长 18.3%,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4.79 亿元,增长 5.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0.77 亿元,增长 31.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3.48 亿元,增长 11.4%。2012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增加了 6.057 亿元,增长了 8.15 倍。同时,经济规模日益壮大,农牧养殖业成绩斐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增长,财政收入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经济规模较小,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低,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增收缓慢等问题。作者认为互助土族自治县作为一个民族地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和着眼点放在特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走出传统经济发展的单一资源粗放窘境,发展特色产业是互助县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关键环节。

第二章为政治建设 with 政治发展,分别叙述了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实践、民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基层民主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在介绍成绩的同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互助县自1954年建立自治地方以来,尤其是自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互助县党委、政府从当地实际出发,根据自治法制定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措施,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成效表现在互助县的经济综合实力有了很大发展,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事业和民生建设得到明显增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少数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自主管理本民族地区各项事务的权利得到实现。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该县的发展起点低,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结合互助县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坚持和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显得非常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互助县的民族关系呈现出良性发展的局面,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互助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全县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以建设“绿色、开放、和谐互助”为目标,紧扣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和构建“和谐寺院”的主线,解放思想,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使互助县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差异,在社会转型期下互助县的民族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差距拉大;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保护群

众合法权益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文化差异引发民族矛盾现象突出；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活动依然存在等，这给互助县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带来了挑战，须引起重视。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助县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不仅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知和参政能力。广大农民的政治独立性增强，必将极大地动摇农村社会非民主化的社会文化根基，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尤其在互助县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设农村基层民主要经过发展、完善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对此，我们应该要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章为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与就业、社会事业管理等。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助县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农村人口的流动，全县的社会人口结构、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都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城镇化、城乡社会均衡发展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之中。尤其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能够更多地、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围绕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助县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新型的社会救助、扶贫体系基本形成，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互助县的城乡社会一体化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四章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在介绍、分析互助土族自治县资源条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县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建设、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互助县县域景观多样，资源丰富，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其中森林、草原和水是最为主要的生态系统。由于高寒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点，局地环境堪称恶劣，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物种数量减少、灾害频发和有害生物增多。因此，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营造林工程以及鼠虫灾害的生物防控就成为实施生态修复和防护治理的关键领域。生态安全问题则主要表现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渐次退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农药、农膜问题以及路网效应。较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侧重于人工生态系统，如城镇、村落、农田等系统的治理与保护，

主要涉及大气污染治理、水环境整治、农业污染防治、垃圾处理等几个主要方面。当然,环境保护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结构上而言,可以分为工程性保护、产业性保护和文化性保护三大类,三者相对独立但却密切相关,从而构成统一过程的不同层面。具体而言,工程性保护主要涉及造林绿化和水源地保护两项举措,其中造林绿化涵盖城镇和农村两大板块,即城镇绿化是重点,农村绿化为主体。产业性保护则涵盖循环农业、生态经济的基本内容,也是加快发展现代性农业的重要途径,而沼气建设则是打造高原生态循环农业新模式的关键一环,即以沼气建设为纽带,连接养殖业与种植业,通过对人畜粪便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最终实现农业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文化性保护本质上是民间传统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及其体系在文化上的智慧体现,它渗透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或相沿为习惯,或升华为信仰,或表现为规约,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独特而又难以替代的作用。

第五章为文化建设与文化保护,重点叙述和展示了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民族艺术及其创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情况,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互助土族民间艺术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是土族人民创造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当代艺术的文化之根。互助县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民族文化的丰厚基础上努力创新,与时俱进,民族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不断超越,展现了新的时代风采。互助县的公共文化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产品日益丰富,各类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成功为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非遗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六章探讨了互助土族自治县的文化产业特点及特色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互助县文化产业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集群,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互助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互助县将旅游经济作为县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旅游业已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